

·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特色栏目 ·

· 中医文化 ·

近代社会变迁视野下的西医传播与近代中医

张婷婷 (上海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 上海 201203)

摘要:随着近代中国国势衰微,向西方学习被认为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道路,西医作为西学重要内容越来越受到国人的认可与推崇。从早期“西医长于外科”到西医学堂的建立,继而到医学维新,再到对西医科学的崇拜,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昭示了近代先进国人在器物、制度和思想观念等三个层面向西方学习以救亡图存的历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近代以来西医的传播和中医的遭遇,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国人对现代性的诉求密切相关。

关键词:社会变迁;现代性;医学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222(2011)02-0070-05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历经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及其思想观念都对传统中国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效应。作为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载体的西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规模传入中国。西医的传入,客观上对中医传统合法性地位造成了深刻的冲击。承数千年国人之保健与医疗维护的传统中医面临了一场多舛曲折的命运。对此,医学史界和历史学界都已有大量论述,多数研究都将研究聚焦于中西医本身的理论体系及其适用性问题,而忽视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性主题对于中西医的影响。本文拟将西医东渐与中医遭遇置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和国人对现代性的诉求中予以考量。

一

有清一代,最早来华的西方人是传教士。藉医传教是西方基督教传教一大传统。西医从传教士的脚步踏入中国开始,便被带入中国。“初期的教士,传教方法很巧妙。他们对于中国人心理研究得极深透。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喜欢

极端迷信的宗教,所以专把中国人所最感缺乏的科学知识来做引线,表面上像把传教变成了附属事业”^[1]。康熙帝躬身体验了西医的疗效。西医的显著疗效让这位对西方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大清国皇帝赞不绝口。康熙晚期,由于耶稣会教士卷入宫闱私斗,乃不见容于新帝雍正,因此康熙年间兴西学的潮流在雍正朝被驱除殆尽,传教士逐渐遭到冷落。

至鸦片战争前后,来华传教士又开始活跃在沿海口岸城市,且多以行医者角色出现。在西方传教士看来,肉体的生命是精神超升的基础。要克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必须采用世俗的手段,而医学比其他西学更具普世性、功效性,更容易得到中国人的接受和认可,因此“扩充医务,似乎是一种好办法,因为在教会各种工作之中,医务受外界的排斥最少,故是为教会事业的中流砥柱”^[2]。

近代医学传教与中国通商口岸开放时间、空间密切相关。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活动仅限于澳门和广东沿海。《南京条约》等不平

收稿日期:2011-03-10;修稿日期:2011-04-18

基金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501)

作者简介:张婷婷(1981-),女,安徽巢湖人,上海中医药大学讲师,华东理工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

等条约签订后,西医也藉传教事业大量涌入中国。从1842年到1848年短短六七年间,广州、厦门、宁波、上海、福州5个通商口岸全部建立了教会医院和诊所。到1905年全国教会医院竟达166所,诊所达241处。

传教士行医的动力来自于基督教的神圣职责,其最终目的是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但与传教士期望不同的是,中国人将医疗的成就与宗教信仰截然分开。人们接受西医只是缘于其疗效上的优势,多数人并不因此而认同基督教。“他(传教士)面临的并非是一种个人的自我的选择,而是异域社会的群体接受策略。异邦的‘土著们’似乎宁愿青睐于表象行为的立竿见影,而很少愿意深究表象背后的精神体验如何定位。”^[3]这与中国的实用理性传统一脉相承。社会民众中普遍认为“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人们在遇到外科、眼科疾病时,常倾向于向西医求助,而内科疾病一般是在中医诊治多次无效后,才去尝试西医。在中国一贯的天朝心态和严守“华夷之辨”的心理防线下,民众对西医仍然保持着疑虑与审慎心态。传教医师处于零星与分散的状态,大多以个人的力量在沿海地区开设小型诊所。作为传统医疗与养生保健的知识体系和技艺,中医于此前后并未受到严重冲击,仍是中国民众主要的就医选择。

二

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武力面前毫无抵抗能力。一些开明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和中国武器装备的落后,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目标下掀起了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其中包括作为诊断治疗技术的医学。

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因自己或家人的就医经历,切身体验到西医的显著效用而大力倡导,并将创办西医教育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李鸿章投资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医学校——北洋医学堂,与其创办的北洋舰队相配套。正如李鸿章在奏章中所述,“查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沉痾,西医尤独擅专长……是兴建西医学堂,造就人

材实为当务之急”^[4]。李鸿章等传统士大夫虽然对西医表现倾慕之心,但在“中体西用”之思想藩篱下,作为传统体制的维护者,李氏等人只是希望借助西医弥补中医之不足,因而提出了“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的中西医汇通思想。在李鸿章的提倡与影响之下,清朝部分官员也起而仿效。1901年李鸿章去世之后,他所提倡的西方医学与军医制度,非但没有“人存政举,人亡政息”^[5],反而在各地风行影从。作为晚清名噪一时的重臣,李鸿章对西医的支持态度在社会上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举国震惊。梁启超惊呼“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一役,日本以彻底的西学打败了洋务运动所行的不彻底西学,雄辩地证明了西学致强的实效。维新人士纷纷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师法日本,实行变法以自强图存。梁启超认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强调国民性的改造。在其《新民说》中,提出新时代新国民应是具有公德观念的“国民”,而不是只知朝廷和君王的“臣民”。“新民说”在近代思想领域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开始意识“新民”对于“新国家”的迫切与必要。而传统社会中,中医各自为政的行医方式和仅仅具备个人救护的特征,缺乏像西医那样集体的医护行动和社会大规模防疫行为,恰恰无法养成国民“公德”观念,也无法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新民”,故无法担当起建立“新国家”的时代任务。

“医学救国论”最早由非医学界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提出,力倡医学维新以强身保种。梁启超将医学的改革上升到关系民族存亡的高度,将医学维新与保国、保种联系起来,疾呼“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希冀采西医强壮国人身体以作为保种保国的基础。

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留日高潮。医学作为富强之术吸引了大批年青人。中国早期的西医中,除国内教会医学校毕业生外,大部分是留日学生。一些激进者效法日本废除汉医做法,要求废止中医。民国时期积极主张废止中医者如余云岫、汪企张、褚民谊、汪精卫等皆曾

留学东洋,回国后长期在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任职,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卫生行政,成为近代废止中医运动的主要推动力。

如果说洋务运动之前,由传教士引入的西医未能对民众的就医偏好产生明显影响,人们视中西医各有千秋,视病而择,中医仍是人们的主要就医选择,那么经历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在精英人士的推崇和官方的倡导下,西医被视为挽救摇摇欲坠大清王朝于将倾的自强之术,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青睐。在经历了“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6]后,人们逐渐接受了西医,传统的就医习惯和医疗观念日渐式微。中医界人士对西洋医学也经历了相似的心路历程,从疑虑到认可、接纳的认知轨迹,最终采取开放的姿态认可与接纳西医,并试图通过“汇通”中西医精华,寻求中国医学的发展路径。^[7]

在政府和知识分子强力干预下,中西医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二者也因此逐渐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在文化启蒙和政治运动的双重交织下,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对峙逐步升级。特别在“启蒙”与“理性”的社会语境下,中医逐渐被置于批判的靶心。罗志田对此作如是之评价,“整个进程是以西医主动进攻而中医防守反击为特征”,“在中西医的竞争中,政治力量发挥了直接的作用”。^[8]

三

在经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一系列的改革失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最根本原因是思想观念的滞后,“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9]。因此,先进的新青年们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解放潮流。它对国人自觉意识的启蒙,对中国的政治走向、思想学术研究旨趣以及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运动派生出的反传统与“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却对传

统中医命运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全民呼唤启蒙与理性的口号声中,“科学”成为了至高无上的评判标准。胡适曾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0]正如美国学者郭颖颐所说,“中国的唯科学论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这样,唯科学主义可被看做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11]从而造成了“唯科学主义”的泛滥,中国所有知识体系都面临一个获得“科学”资格的问题。中医自不例外。既然以西方医学作为“科学”标准,那么建立在阴阳五行基础之上的中医就处处显得不“科学”,只能被当作“封建迷信”而扫除殆尽。

陈独秀宣称,“(中)医不知科学……其术殆与矢人同科”。^[12]胡适自称是“信奉西医的人”,对中医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中医注定只能与“骈文、律诗、八股、静坐讲理学”等放在一起,只能处在“非科学”的黑暗之中。此外,新文化运动的其他代表人物如鲁迅、周作人、傅斯年、郭沫若等,都将中医置于“科学”的对立面而不遗余力地批判。

新文化运动的新旧文化之争、中西文化之争在医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中西医双方互赐恶谥。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新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而中医自称为国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称之为西医甚至洋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这场名称之争暗含了中西医冲突的思想史内涵,由“华夷”语境中对西方文化的鄙薄,发展到“中西”语境中双方的对等,再到“新旧”语境中双方地位的倒置,^[13]语境的转换也导致了中医命运的变化。

基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任务的迫切性,1919年五四运动后,这场以启蒙而开始的“新

文化运动”,最终还是回归到了激烈的政治改革上,诚如李泽厚所言,“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14]

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面白纤细,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的青年身体的讨伐批评等,说明他们对于身体的存在有着一份功能性的想象和期待。^[15]这份功能性的想象和期待,与西医在诊治疗效、疾病防疫、群体保健等方面的功能恰好一致。因此,西医在提高国民抵抗力和集体意识方面更契合近代中国“救亡”主题。正如杨念群所指出,“在中国人的身体越来越服从国家整体规训需要的境况下,中医恰恰缺乏集体防疫能力——而不在于其缺乏治疗能力,这样就很难满足国家对社会的整体规划需求”。^[16]因此,在那些矢志于救国救民的新青年看来,中医呈分散状态面向每个病人个体,而现代医学以群体体魄的改造为基本职能,最终指向保国与保种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以个体为对象的“中医”与以群体为对象的“西医”之间的差异,不仅关涉着“迷信”与“科学”的二元对立,而且也是“亡国”与“救国”政治分界线的标志所在。这“恐怕也是近代中医遭受歧视与批判于‘科学’衡量标准之外的另一个颇具‘政治’意涵的原因。”^[17]

在迫切的“救亡图存”任务下,在效用至上、功利主义的心态下,承载着太多传统性因素的中医,正是由于其自身的缺陷,使得其无法担负起近代救亡任务,成为各方口诛笔伐的对象也就成为不可避免之事。这最终导致了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出台。

1929年,西医余云岫等人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必须效法日本废止汉医的经验,藉国家政治力量,诉诸行政强制手段,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医。在近代社会政治大变革的背景下,中西医的学术之争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医界的纷争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一般民众

的医疗观念,“虽然大多数人并不像余氏那样坚决废止中医,但都认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应基于西医而不是中医。”^[18]在政府的倡导和政策支持下,西医日益受到民众认可和接受,而中医却陷入了江河日下的窘境。近代名中医恽铁樵不无担忧地说:“晚近欧亚沟通,我黄农华胄,在在相形见绌,几无一长可录。推究因果,岂不以此?固不独医学为然。然紫色夺朱,郑声乱雅,其最难辨识者,必其最精深者。故百凡艺术之衰竭,医为尤甚。……偶读西医余云岫《灵素商兑》一书,未尝不废然思返也。”^[19]西医成为逐渐占据了医疗格局中的主导和优势地位。

四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和“现代化”的语境下,“向西方学习”的口号简单地将东西方的空间上并列关系转化成传统与现代的时间上线性关系,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向西方趋同的赶超关系。^[20]就医学来说,中西医因植根于不同文化体系而具有的地域差别被置换成旧与新、落后与先进的时间上的差别。在“现代化”观念下,西医以日本废汉医、采西医而强大为实例,认为用代表“先进”知识的西医来淘汰“落后”的中医自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有之义,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医学领域的体现。因而西医以植根于近代西学而取得了学术上权威性和政治上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为批判中医提供了行动上的“正当性”。

因此,中医在近代的遭遇及其命运可以看成是西方现代科学理性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碰撞交融过程中两者之间不平等地位的体现。透过西医,人们能够看到西方近代技术即器物层面的文化(手术刀、显微镜),能够看到西医背后的制度层面的文化(诸如医院制度、医疗教育制度),也能够看到由西医体现出来的西方精神文明、伦理道德(人道主义),看到整个西方文化。在晚清输入中国的西学中,西医最早,影响最广,也最为深入人心。^{[21]305}从早期“西医长于外科”到西医学堂在中国的建立,继而到医学维新,再到对西医科学的推崇,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昭示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器物、制度和思

想观念等三个层面向西方学习的历程。正如何小莲在其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林则徐知道西医有用,李鸿章知道西医有效,康、梁、谭看到西医有道,到了孙中山、鲁迅、胡适,则变成了完全的西医派。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演进,与西医传播的范围、影响的深度成正向关联。^{[21][322]}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医的传播和中医在近代以来的命运,是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历程和国人对现代性的诉求密切相关。

但值得思考的是,西医作为科学性与人文性双重共轭的知识体系,被引进中国似乎多局限于体现着科学性的生物学、化学、生理学等“功用”层面知识,而其所赖以孳生的文化土壤如理性、实证精神、客观的态度似乎迟迟未能在中华大地落地扎根,“废止中医”这类言论恰是一种缺乏理性和客观态度的表现,却正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的延续与复归。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6.
- [2]傅维康. 中国医学史[M]. 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0:447.
- [3]杨念群.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23—1985)[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6.
- [4]李鸿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261.
- [5]杨明哲. 李鸿章与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布[J]. 长庚人文社会学报,2009,2(2):334.
- [6]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711.

- [7]郝先中. 清代中医界对西洋医学的认知与回应[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1):37.
- [8]罗志田. 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77-82.
- [9]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89:45.
- [10]胡适. 科学与人生观序[M]. 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2.
- [11]郭颖颐.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M]. 雷颐,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3.
- [12]陈独秀. 敬告青年[M]//独秀文存.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9.
- [13]郝先中. 传统与现代性:近代中西医论争的文化表征[J]. 皖西学院学报,2008,24(1):136.
- [14]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6.
- [15]黄金麟. 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 台北:新星出版社,2006:55-56.
- [16]杨念群.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23—1985)[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
- [17]张婷婷. 近代社会思潮对中医的影响[J].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6(1):115.
- [18]奚霞. 上海民国时期的中西医论争[J]. 中医文献杂志,2005,23(1):47.
- [19]恽铁樵. 群经见智录:自序[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79.
- [20]许纪霖,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3-4.
- [21]何小莲. 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Western Medical Transmission and Modern TCM Encoun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Social Change ZHANG Ting-ti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clin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power, learning from the West is considered as the only way to save the nation from extinction and ensuring its survival. Western medicin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Western learning,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respected by more and more national people. Actually, the survival and salvational process of modern advanced national people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t three levels of implements, systems and ideological concepts is declared publicly from one side from early western medicine being good at surger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western medical schools, then to the medical reform, finally to the worship for western science. To a certain extent, western medical transmission and TCM encounter are closely related to modern Chinese social change and the appeal of national people for the modernity since modern times.

KEY WORDS: social change; modernity;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